

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

——一种打开黑箱、强调能动的方法论尝试

刘骥 张玲 陈子恪*

【摘 要】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解释。在为现实生活中的某种行为、现象或事件寻求解释时，我们可能并不满足于“X 导致了 Y”这样的说法，好奇心会驱使我们继续追问：“X 是如何导致 Y 的？”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探寻机制的过程。回顾科学解释从覆盖律到因果机制的发展过程，梳理了因果机制的几种代表性定义，并试着通过两组二元对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来把握这些不同定义背后的哲学倾向。最后得出结论，社会科学之所以要找因果机制，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探究因果机制，有利于降低层次、缩短时滞，挖掘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过程和环节，从而打开黑箱、增强解释力；与覆盖律或因果效应相比，因果机制更加强调能动的作用，更加适用于充满能动者的社会科学领域，并为我们分析和研究能动性因素提供一种途径。

【关键词】 因果机制 能动性 过程追踪

【中图分类号】 C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11) 04 - 0050 - 35

引 言

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这是本文的中心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 刘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张玲，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陈子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感谢对本文提供批评与建议的学者及友人。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NKZXB10151）。

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来梳理文献、整理观点。

首先，因果机制能够为社会科学提供更细致、更深入、更能满足好奇心的解释。在为现实生活中的某种行为、现象或事件寻求解释时，我们可能并不满足于“X 导致了 Y”这样的说法，好奇心会驱使我们继续追问：“X 是如何导致 Y 的？”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探寻机制的过程。探究因果机制，有利于降低因果关系的分析层次并缩短各个环节之间的时滞，挖掘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实体和链条，从而打开黑箱、增强解释力。

其次，因果机制能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更让人心安的解释，这种方法论理念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科学研究所遭遇的结构（structure）与能动（agency）之间的张力。覆盖律模型和基于因果效应的因果关系都过于强调结构的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方法论理念中，我们看不到能动者（agent）的因素，只是简单地知道原因变动结构性地决定了结果的变化。与之相比，因果机制这个概念可以赋予能动者更大的空间。一旦开始探究机制，我们关注的焦点就从结果转向了过程，在挖掘出能动者的同时也赋予能动者以选择的自由。

一、从覆盖律到因果机制

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解释^①。在科学哲学领域，我们基本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的解释观——覆盖律解释模型与解释的因果性理论，它们代表了科学解释中两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倾向。

亨普尔（Hempel）的覆盖律模型（covering-law model）曾一度成为科学解释的共识，被誉为“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②。这种观点认为，解释就是论证，即由一系列前提演绎推导出一个结论。在亨普尔看来，科学解释的实质就是把现象的

① 当然，这可能不是社会科学的唯一任务。

② 克里斯托弗·里德·希契科克（Christopher Read Hitchcock）认为“科学解释哲学研究的现代历史从亨普尔和奥本海姆的‘解释逻辑之研究’开始”，威斯利·C·萨尔蒙也在《科学解释四十年》一书中称这篇文章为科学解释的“里程碑”。参见 Hempel & Oppenheim（1948）；Salmon（1989：8）；Hitchcock（1995）。

出现和发生归结于普适定律（亨普尔后来对模型进行修正，将统计定律也纳入其中^①），这也就是“覆盖律解释模型”这一名称的由来。不难看出，这种观点确实有吸引人之处：“表明一种现象是某个普适定律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祛除了它的神秘性。”（萨米尔·奥卡莎，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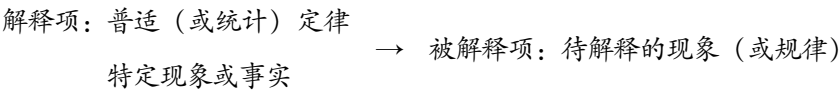
亨普尔概括出覆盖律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表 1 覆盖律解释模型的形式

解释项 定律	特定事实（Particular Facts）	普遍规律（General Regularities）
	D - N 演绎—律则 (Deductive-Nomological)	D - N 演绎—律则 (Deductive-Nomological)
普适定律 (Universal Laws)		
统计定律 (Statistical Laws)	I - S 归纳—统计 (Inductive-Statistical)	D - S 演绎—统计 (Deductive-Statistical)

资料来源：Hempel（1965）；转引自 Salmon（1998：307）。

然而，不管何种形式，覆盖律解释观的核心都是规律和论证，其示意图如下：



由此可见，从解释项到被解释项的过程，必须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现代科学的许多解释（尤其是物理学）都符合亨普尔所描述的形式：在普适定律和一些附加事实面前，一种现象不得不发生。例如，苹果落地这一现象可以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一些附加假定经过演绎推导出来。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型为经验科学中的解释程序提供了一个系统的逻辑分析基础和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也就是将解释还原为形式化的逻辑论证。

^① 1948 年的文章并没有讨论统计解释的问题。后来，在《科学解释诸方面》中，亨普尔又按类似于 D - N 模型构造的想法和要求对统计解释做了形式定义。参见 Hempel & Oppenheim（1948）；Hempel（1965）。

尽管覆盖律模型很好地握住了科学解释的典型结构，但它也碰到了许多棘手的反例，最为明显的便是对称解释问题和无法排除相关项问题^①。随着大量反例的出现，亨普尔的解释模型越来越站不住脚。今天，这种解释观已不再是共识。

既然覆盖律模型面临如此多的质疑和批判，那为什么研究者们还孜孜不倦地修正，而不是直接抛弃这种解释模型呢？其根源还是在于休谟问题^②，作为一名经验主义者，休谟认为在人类认识领域内不可能发现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根据（休谟，1980）。通过反驳任意形式的归纳推理，休谟得出结论认为，因果性——理解和认识世界的脚手架——在逻辑上无法被证明（Stegmuller, 1977）。休谟这个诘难对于人类一直推崇的理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大多数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令人惊讶的结论，不过，由于休谟的论断，他们还是倾向于把因果性看作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概念。如果一个经验主义者的目标是像亨普尔那样去澄清科学解释这一概念，那么诉诸因果性这个本身就需要澄清的概念就没有任何说服力。因此，面对休谟问题这座大山，经验主义者只有选择“绕道而行”。为了回避富有争议的因果性问题，他们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和论证形式上来，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即为典型代表。

此外，覆盖律式的理论图景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例如，牛顿通过精确的定量形式表明，他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不仅可以解释各种物体运动现象，甚至还可以解释一般的普遍规律，如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和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致力于追求大一统的自然科学总是希望以更简洁的理论来解释更多更复杂的自然现象，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满足了这个标准。

① 对反例的详细论述，参见奥卡莎（2009）；张华夏（2002）；Lyon（1974）；Salmon（1992：21，22，23，31）；Salmon（1998：3，93，340）；Scriven（1959）。

② 哲学史上关于什么是休谟问题存在分歧。一部分哲学家将因果问题视为“休谟问题”，例如康德。他最初引进“休谟问题”是指因果性的认识论地位问题，康德指出：“休谟主要是从形而上学的一个单一的然而又是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连结概念（以及由之而来的力、作用等等概念）出发的。”在康德看来，对因果关系的论证就是对休谟问题的回答。不过，绝大多数哲学家还是把休谟问题理解为归纳问题。波普尔就最早将归纳问题称作“休谟问题”，并将其概括为关于“归纳推理是否得到证明，或者在什么条件下得到证明的问题”。在当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归纳问题”与“因果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是因为归纳无法获取确定性知识，因果关系的实在性才无法得到证明。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因果问题”。参见康德（1978）；波普尔（1987）；陈晓平（2003）。

实际上,覆盖律模型反映的正是自然科学的解释倾向。对自然科学家而言,他们完全不需要介入研究对象本身,他们关注的仅仅是定律和证明定律而已。尽管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但它所构建的理论图景却把心灵留在了画面之外,没有为喜怒哀乐善恶美丑留下席位(陈嘉映,2007)。乔治与贝内特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个人——具有反思性(reflectivity)(George & Bennett, 2005)。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总是试图去了解、预见事件的未来状况,并根据自己的这些预见、期望来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参与者的预见和期望在付诸实践过程时反过来又会影响和改变事件的发展进程,通过所经历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形成一种变化莫测的动态关系(索罗斯,1999)。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理论必须恢复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为者(actor)概念(吉登斯,2001)。但在亨普尔的解释框架中,我们常说的个人能动性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试想,一个没有为能动提供任何席位的解释模型如何能够适用于充满能动者的社会科学世界呢?

经验主义者对整个哲学体系的建构依赖于他们对“真实”这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对他们来说,说某事物是真实的(real),乃是指我们已经经验到或能够经验到这种事物。因果性不是经验范围内的事物,因而不是真实的。然而,说某事物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指这种事物独立于知者而存在,不论它是否属于自然世界或社会世界,也不管我们是否已经或能够经验到这种事物,实在论者就持这种观点。因此,连结原因和结果的因果性无论能否被观察到,都是真实存在的。概念理解上的鲜明反差使实在论者不会有经验主义者对休谟问题的那种敬畏。他们在另一个维度上开辟了一种新的解释观——解释的因果性理论^①。

实在论认为,“科学解释就是要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性和内在机制,阐明它在整个自然图景和层次结构中的地位”(Salmon, 1989: 120 - 122)。因此,解释必须是因果性的,也就是使被解释事件合于自然界的因果模式。在经验主义看来,“因果关系完全是对可观察变量之间的经验性规律进行建构,并没有潜在的因果性、

^①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覆盖律解释与因果性解释之间的区别并不太大,因为从一个普适定律演绎推导出一种现象的发生往往就是给出它的原因。然而,二者并非完全等同。事实上,许多学者之所以倾向于解释的因果性理论,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它可以避免覆盖律模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本文中,二者之间的分歧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因果力或因果必要性”；但对实在论来说，“因果机制和因果力是根本性的，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找到在经验上被证实的关于因果机制的理论和假设”（Lewis-Beck & Liao, 2003: 100）。在实在论的传统中，萨尔蒙的因果性理论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一派（Mayes, 2001）。他认为，科学解释关注的对象应该是过程而不再是事件或事实。因此，解释一个被解释项实际上就是追溯导致被解释项发生的因果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尽管解释的因果性理论在科学哲学上还存在许多争议，但相对于覆盖律解释模型，这种解释观至少为能动找到了一点依靠。在谈到“因果力”或“因果作用”时，我们往往在直觉上认为其中潜藏着一个能动者的概念^①。同时，覆盖律模型的解释最终都要诉诸某种更高层次的规律，而因果性理论（即使不是所有的因果性理论）的解释则更为关注处于更低层次上的可能原因，这就有可能把我们关注的焦点引向个体，引向能动。

那么，我们如何找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呢？在不陷入哲学争论之前，实践中的研究者^②对因果关系的推理一般会诉诸两个基本的概念——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s）和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King et al., 1994: 76-91）。因果效应是指解释变量值的变化所造成的系统观测要素的变化（King et al., 1994: 81-82; Brady & Collier, 2004: 276-277），它强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共变性关系模式。基于因果效应的因果关系追求的是能够解释和预测更多更复杂现象的普遍性理论。在这种观点看来，理论的主要目标在于预测，而不在于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仅是预测的工具而已）。从操作方法上来看，发现变量间因果效应的主要工具是大样本的统计分析。而因果机制的重点则在于解释变量如何导致被解释变量的过程。正如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言，因果机制对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对单个事件提供深入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埃尔斯特，2009）。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小样本的案例研究，尤其是过程追踪法，是挖掘因果机制的重要手段（Dessler, 1991; Yee, 1996; Little, 1998）。

如果解释是社会科学想要抵达的彼岸，那么因果效应就好比是通往彼岸的一

① 关于这个问题更深入的讨论，参见徐向东（2008）。

② 英文原文为“working social researcher”。这里的“实践”与“思辨”相对应，它强调研究具体的经验问题，而不是就哲学谈哲学，就方法论谈方法论。

座桥梁，而因果机制则更像是通往彼岸的一叶扁舟^①。基于因果效应的因果关系旨在追求普遍性的理论，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尝试似乎大多都以失败告终，政治学领域中的典型例子莫过于对民主与和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早期的学者试图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检验诸如“民主国家不打仗”这类命题的经验有效性（Doyle, 1983）。然而，尽管统计方法可以回答民主政体与和平之间“是否”相关这一问题，但它无法解决这种相关“为什么”存在的问题，即无法提供从民主到和平之间的因果机制。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远比研究者某种普遍性理论的简化假定复杂得多，基于因果效应的解释显然无法解决这一困境，正如埃尔斯特所言，“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普遍性）理论的目标——建立普遍和永恒的命题——永远是一个虚幻的梦想”（Elman, 1997；Owen, 1994；Layne, 1994；Ray, 1995：151，158-159）。鉴于此，对于民主与和平之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分析。

退一步来说，即使我们能够找到或建立这种普遍性的理论——规律，诉诸规律的说明可能还是无法构成解释，或者至少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在 $X \rightarrow M \rightarrow Y$ 这样一条因果链中，因果机制会把注意力放在对 $X \rightarrow M$ 以及 $M \rightarrow Y$ 的论述上，而因果效应则只关注 $X \rightarrow Y$ ，排除任何有关 M 的论述。基于因果效应的因果关系重点揭示，自变量 X 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因变量 Y 的变化。但这种因果关系并没有告诉我们， X 的变化是如何导致 Y 的变化的。与动物相比，人有一种探索“现象背后的实在”的固有好好奇心（所罗门，2004）。我们不仅想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们更想知道原因是如何作用于结果的。波普尔（K. R. Popper）也指出，即使是反复问“为什么”的儿童，他也不要求人们给出更充分的原因，而只是希望人们给出导致事件发生的连续“因果链条”而已（波普尔，1999）。

基于因果效应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方法曾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统治性的地位，但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从因果机制的角度来挖掘因果关系，出现了与“统计世界观”（statistical worldview）（King et al., 1994）相对的“机制世界观”（mechanic worldview）（Gerring, 2008）。有些学者认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探究

^① 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教授更是一语道破：“桥即彼岸，彼岸即桥”。

基于因果效应的因果关系，有没有因果机制并不重要（King et al.，1994：86）；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因果机制在本体论上先于因果效应，如果不能说明如何的问题，就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Yee，1996：84）。不过大多数时候，社会科学研究者并没有把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截然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因果机制是因果效应的重要补充。尽管围绕因果机制这个概念本身到底是什么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机制对于因果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逐渐成为共识。为了得到更深入、更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不仅需要摆脱覆盖律解释模型的束缚，建立和验证基于因果效应的因果关系，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打开因果关系的“黑箱”，找到其中的因果机制。

二、什么是因果机制（因果机制的概念界定）

（一）不同的机制观

近年来，因果机制这个概念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讨论因果机制的不光有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思辨的哲学家，还有实践中的社会科学家，但几乎没有哪个学者能够系统地说清因果机制到底是什么（Mayntz，2004；Gerring，2010）。鉴于此，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本文并不打算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而是试图通过考察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争论来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是否具有本体论地位是学者们围绕因果机制展开争论的第一个焦点。一些学者认为，因果机制是理论上的实体，它只存在于研究者的观念之中。在概念界定上，一些人的表述相对明确，例如赫德斯特伦与斯维德贝里（Hedström & Swedberg）把机制看作一种分析性建构（analytical constructs），认为机制提供了“可观察事件之间的假设性联系”，它是与研究者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实体，在本质上与理论不可分。另一些人的表述则更模糊一些，他们只是把因果机制简单地视为中介变量（链）。例如，按照布雷迪和科利尔的定义，因果机制是“因果过程中的一个链条或节点。在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既定的因果关系中，因果机制所假定的附加变量（有时称作中介变量）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自变量实际上是如

何产生结果（包括这种结果发生所经由的顺序）的”（Brady & Collier, 2004: 277）。

然而，大部分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强调因果机制的实在性，主张赋予机制以本体论地位。例如，马奥尼在《超越相关关系》一文中批评中介变量的界定并没有超越相关关系的假定，它无法区分一个变量到底是自变量还是作为因果机制的中介变量（Mahoney, 2001: 578）。因果机制区别于自变量的关键在于其本体论地位，即机制是事物的一种内在属性。

此外，因果机制是否可观察也是学者们争论的另一个焦点。一些人认为因果机制是不可观察的实体，例如乔治与贝内特指出，因果机制是“最终不可观察的物理、社会或心理过程”（George & Bennett, 2005: 137），“不管我们将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边界推到多远，因果机制仍有一些不可还原的、无法观察的方面”（George & Bennett, 2005: 143）。与乔治和贝内特的温和主张相比，一部分学者坚定地把不可观察性作为判断因果机制的标准。例如，马奥尼认为“因果机制是在研究者想象中存在的关系或过程；它们并不指代任何特定的经验条件”，它们是“不可观察的实体”（Mahoney, 2001: 580）。

然而，对其他一些学者来说，因果机制是可以观察的，例如赫德斯特伦与斯维德贝里写道：“基于机制的解释通常被认为是某种‘因果能动者’（causal agent）引起了可观察实体之间的关系。”（Hedström & Swedberg, 1996: 11 - 13）雷斯基（Reskin）也坚持认为可观察性是界定所有机制的标准（内部心理机制除外）（Reskin, 2003）。尽管邦奇（Bunge）认为“因果机制大多都是隐藏着的”（Bunge, 1997），但他还是从唯物主义（materialist）的视角界定“机制是具体（物质）体系中的过程”（Bunge, 2004）。在这一点上，埃尔斯特特的表达似乎更委婉也更机智一些：“因果机制是经常出现和易于辨识的因果模式。”（Elster, 2007: 36）

最后，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还在于因果机制是否是决定论式的。利特尔（Little）描述因果机制是“由类似法则的规律性（lawlike regularities）支配的一系列事件或条件，从解释项引出被解释项”（Little, 1991: 15）。同样，马奥尼在自己所主张的第三类因果机制定义中指出：“因果机制一旦被激活，就会产生有趣的结果。”（Mahoney, 2001: 580）这就意味着，因果机制在本质上与规律没有区分，都是一

种决定论式的论断。

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因果机制是可变(portable)(或不确定)的。例如,埃尔斯特明确指出,“其(因果机制)发生通常在不为人知的条件下或具有不确定的后果”(Elster, 2007: 36)。同样,法来蒂和兰什认为,因果机制要产生影响,需要与给定的背景相互作用(Falleti & Lynch, 2009: 1145)。

(二) 对不同机制观的分类

在简单梳理了因果机制的概念分歧之后,我们打算利用两组哲学上的二元对立——实在论(realism)与反实在论(anti-realism)、决定论(determinism)与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来分析这一概念。这些“主义”(-ism)与大多数哲学主义一样,都是以不同版本出现的,单从一个方向入手很难精确把握其内涵,只有在与其理论对手的比较之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基本观点。更有趣的是,在思想史上,“××主义”的名号多半不是出自于己方阵营,而往往是其理论对手扣上的帽子。对于这些争论,我们试图通过两组二元对立画出一个二维表格,确定不同学者所主张的因果机制定义在这个表格中的位置。

1. 认识论上的对立: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针对前两种分歧,我们引入第一组二元对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或工具论)。在实在论看来,科学的目的是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为世界提供一种正确、客观的描述。而反实在论则认为,我们只能对可观察的世界提供解释。对于不可观察的世界,科学所提供的描述正确与否并不重要。科学理论只是有助于我们预测可观察现象的工具而已,作为树立知识结构的脚手架,一旦它们不再有用,就会被抛弃。可见,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议在于客体的性质及其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属于哲学认识论讨论的范畴^①。

实际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核心是可观察事物与不可观察事物之间的区分。如果因果机制是可观察的实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并没有太大差

① 曾志在《西方哲学导论》中把知识论划分为三类:知识起源论、知识对象论、知识判断论。如果说知识起源论是从形式方面探讨知识主体的主观作用的话,那么知识对象论就是从内容方面揭示知识客体的性质及其与主体的关系,而知识判断论则是对“何为真理”这一问题的回答。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二元对立属于知识对象论所探讨的范畴,参见曾志(2001)。

异。然而，如果因果机制是不可观察的实体，两者对待因果机制的态度便会截然不同。实在论者认为挖掘因果效应背后的因果机制是研究者的根本任务。在他们看来，因果机制是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研究者也能够对不同因果机制的优劣程度做出评价。反实在论者则认为，研究者只能对可观察的原因和结果进行阐释说明，因果机制仅仅是为了作出更好的解释，作为一种工具，它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好坏。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如果机制是不可观察的，无论是实在论者还是反实在论者，他们都只是在对因果机制进行概念化的抽象描述而已。

乍看起来，可观察性似乎是判断因果机制的重要标准，其实不然。可观察性只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辩的核心，确切地说，是反实在论在回应实在论的攻击时发展出的观点。不过，它并不是因果机制的固有属性。这是因为，可观察性本身是一个变量，它会随着观察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随着复杂研究技术的发展，观测手段也会相应地提高（Mayntz, 2004）。机制可能是可以观察的，也可能是人无法直接观察的。对实践中的研究者来说，即便是不可观察的机制，他们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判断其作用。否则，对因果机制的挖掘也就无从进行，而社会科学所谓的“找到因果机制”也就失去了意义。

2. 本体论上的对立：决定论与非决定论^①

对于因果机制我们可能还会问，是不是条件满足，机制就一定会发生作用，并且相同的前提条件能够保证相同的结果？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引入一组基于哲学本体论的二元对立——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波普尔曾将决定论分为宗教决定论、“科学”决定论和形而上学决定论三种类型（波普尔，1999），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第三种基于哲学本体论的决定论^②。

决定论认为，宇宙中的每一个事件，包括人的每一次行动在内，都有其充分的、自然的原因；如果较早的情况已经确定，那么一个事件就会遵照自然规律必然地发生。这种学说断言，宇宙中的一切事件都是确定的，或者是不可变更的，

① 关于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问题，参见徐向东（2008）；Berofsky（1966）；Pears（1963）。

② 本体论（ontology）是对存在的本质、基础及结构问题的哲学探索，相当于广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探讨宇宙和事物存在的终极本质和永恒原理。

或者是预先决定的。相反，非决定论认为，不是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因，尤其是人的意识和行为。在这种学说看来，如果至少有一个（未来）事件不是预先决定的，那么决定论就应遭到摒弃。

决定论者倾向于主张机制性解释与覆盖律解释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差异，“只不过覆盖律解释本质上是从宏观到宏观的演绎，而机制性解释则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演绎”（陈云松，2008）。而非决定论者则认为规律与机制完全不同，正如埃尔斯特所言，假设规律的形式为“如果 A，则 B”，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因果机制的形式应当是“如果 A，则可能是 B₁, B₂, …, B_n”（或者“如果 A₁, A₂, …, A_n, 则可能 B”）（埃尔斯特，2009）。

基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决定论与非决定论这两个划分维度，我们可试着将不同学者的因果机制定义归入以下表格^①。

表 2：因果机制定义的分类

	实在论	反实在论
决定论	马奥尼	
	利特尔	
非决定论	法来蒂和兰什	赫德斯特伦与斯维德贝里
	乔治与贝内特	埃尔斯特
		蒂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脆弱的共识

通过梳理上述两组二元对立，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不同学者在因果机制定义问题上的哲学倾向，同时这也为我们寻找学者们勉强达成的共识奠定了基础。

在“实在—反实在”的二元对立中，我们很难确定“因果机制”这一概念在整体上更靠近哪一端。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强调因果机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第一部分对解释观的回顾来看，实在论所主张的因果机制显然是为了否定经验

① 当然，不是每一位学者都能做到系统地反思其方法论立场，他们自己可能也不一定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

主义的覆盖律解释提出的。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实在论对因果机制实在性的论证始终无法令人满意。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因果机制理解为某种手段或工具，机制这一概念已经不再专属于实在论。无论是实在论者还是反实在论者，他们对因果机制的探究都是为了找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环节和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与因果机制相对的是“黑箱”。在社会现象中，机制可以是事件、活动、关系、过程等^①。我们需要把一个个黑箱拆解开来，直到满足我们的研究目的和认识需要为止。由原因导致结果的过程可能用一个理论概念就可以概括，也可能需要多重机制的共同作用来说明，但关键问题是明晰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原因“如何”导致结果。

在“决定—非决定”的二元对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者都持非决定论的立场。决定论者往往强调只有经过桥梁才能顺利到达解释的彼岸，而非决定论者则可能更为关注一叶叶摇曳在水上的扁舟。从这个角度看，与因果机制相对的是“规律”。一般来说，规律通常假定在具备特定初始条件的前提下，某一事件（原因）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其他种类的事实（结果）。对机制的探究就是要打破（至少是削弱）这种确定性，也就是说，即使初始条件都具备，结果也不一定发生，因为能动者的选择和行为会起作用。

三、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

在梳理完概念之后，我们得到了因果机制的脆弱共识：它一方面关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过程或环节，另一方面强调包括能动者在内的不确定的因果模式。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详细说明寻找因果机制的原因。

^① 希尔与卡岑斯坦在一篇介绍“分析折衷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的文章中，把机制定义为“所有立即产生效应的实体——不管是个体行动还是选择、社会关系还是网络、环境还是制度特征、特定事件还是背景因素、个体感知的倾向还是集体分享的理念与世界观，这些效应产生的过程在跨背景的条件下可能会重现，也可能不会，这些过程或许可以直接观察，但通常不能”，参见 Sil & Katzenstein (2010)。

（一）增强解释力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理论实际上是在简洁性与解释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①，正如计算机系统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寻求平衡一样。最简洁的理论形式莫过于数学化的方程，例如牛顿用几个方程式描述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律，而最复杂的可能就是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

毋庸置疑，覆盖律解释模型过于强调简洁性而忽视理论与经验相符的程度。一方面，一个包括似定律（lawlike）命题的 D-N 解释“并没有加强理解”（Bunge, 1997: 412），它没有给出回答一种相关关系为什么存在的线索，“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覆盖律解释通常是一种‘黑箱式’解释”（Hedström & Swedberg, 1996: 287）。另一方面，D-N 解释中所使用的定律即使不具有普适性，也往往具有较高的普遍性。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很难像物理学那样找到普遍性定律。既然寻找定律只是徒劳，那我们是不是只能流于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呢？默顿（Merton）指出，在社会定律和描述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层面（Merton, 1968: 39-72），即因果机制。这一观点逐渐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Hedström & Swedberg, 1996; Elster, 1998; Pawson, 2000），他们承认在社会科学领域因果机制是比定律更优的选择。

对这些学者而言，机制性解释的吸引力在于微观层次的关系可能比宏观层次的关系更接近于经验。与因果关系相比，因果机制通常位于更低、更细致的分析层次上（Brady & Collier, 2004: 277）。就这一点而言，斯汀康比（Stinchcombe）对机制作用的论述较为准确：“我用机制一词是指：①一种科学推理，它可以独立地加以证实，并且独立地引起理论推理；②以了解另一理论（通常是分析层次“较高”的理论）的组成过程（一般而言是处于“较低”层次的分析单元）；由此③用大量“实体的增殖”（multiplication of entities）来提升较高层次理论的弹性、精度、复杂性、优美性或可信度；④又不太违背（需要对较低层次做必要简化以使较高层次理论成立）我们所了解的较低层次的事

① 当然，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具有强解释力的理论也可以很简洁。

实。” (Stinchcombe, 1991: 24 -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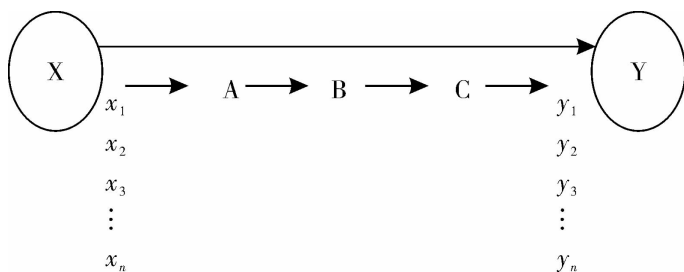


图1 因果机制：降低层次、缩短时滞

资料来源：刘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案例研究》课，课件。

从图1我们不难看出，因果机制有利于我们降低解释的分析层次，缩短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时滞。一方面，降低分析层次使研究者对问题的分析和阐释更加接近我们的直接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思考问题本身。另一方面，缩短时滞有利于研究者挖掘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实体和环节，这让我们更清楚因果作用的链条。具体来说，降低层次的价值在于通过更加微观的要素来解释相对宏观的要素，以此找到解释的微观基础 (microfoundations)^①。缩短时滞的意义在于通过减小每个要素或环节之间的时间间隔，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也让解释更令人信服。当然，降低层次与缩短时滞常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是前者强调分析层次的价值，后者关注时间的意义。

一旦从宏观抽象的层次降到微观具体的层次，从强调结果转向关注过程，我们就更容易回答“如何”的问题，解释也就更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例如，在一篇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突然下降的著名论文中 (Donohue III & Levitt, 2001)，列维特 (Levitt) 及其合作者唐诺修 (Donohue) 宣称，堕胎合法化才是导致犯罪率突然、持续、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列维特展示给我们的只是堕胎

^① 极端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的微观基础就是自然人，解释必须还原到个体，否则就没有微观基础，如新古典经济学。而温和的观点则认为，微观基础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要诉诸更低层次的行为体，解释就算有微观基础。前一种观点参见 Little (1998: 165)，Elster (2007: 13)；后一种观点参见 George & Bennett (2005: 144)，刘骥 (2009)。

率与犯罪率之间关系的经验数据，我们可能不会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更想知道：堕胎合法化到底是如何影响犯罪的。经验数据表明，单亲或贫穷等高危家庭出生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为罪犯的概率比普通孩子要高。他们提出，在堕胎合法化之后，那些没有结婚、未成年或非常贫穷的女性可以选择堕胎，这就降低了非期待儿童（unwanted children）的出生率，从而减少了犯罪高危人群的数量，降低了犯罪率。在分析过程中，列维特等人把分析层次从整个社会降低到家庭，拉入非期待儿童出生率这一关键的中间环节，为我们展示了从堕胎合法化到犯罪率下降的因果机制。

（二）强调能动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提到，社会科学不可能完全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也不可能照搬其分析的逻辑框架。这是因为，“辨别人的行为和制度，它依据的不是某些共同的物理特性而是其对当事人或参加者所具有的意义，这一事实导致人文和社会现象或者不受严格的自然因果律的支配，或者无法进行外在的经验比较研究，或者这两种结果兼而有之”（Salmon, 2003）。可见，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关键在于其研究对象的能动特征。因而，区分“结构”与“能动”这两个基本概念对社会科学来说至关重要。那么，结构与能动到底是什么呢？不同的学者是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结构观与能动观各自眼中的因果关系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致说来，社会科学中的“结构”是“在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之下潜藏的各种社会安排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沃斯特，2000）。相较而言，“能动”这个术语指的是主体通过行使自己的内在力量来引起或产生一个能动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由于外在因素而采取一个行动（徐向东，2008）。也就是说，能动关注人在能动过程中于意识层面所发生的事情，主要考察主体赋予其能动的意义和能动的原因或动机，主体间互动沟通意义的种种方式，以及稳定的主体间社会世界借以确立的方式。

通过“简单—辩证”和“内部—外部”两个维度，海伊（Hay）用一个表格大致勾勒出了不同的“结构—能动”观（表3）：

表 3： 不同的“结构—能动”观

“内部”解释		“外部”解释
(以能动为中心)		(以结构为中心)
简单的“结构— 能动”观	意图主义 (intentionalism)、 建构主义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辩证的“结构— 能动”观	结构化理论 (structuration theory)	批判性实在论 (critical realism)、 “策略性—相关性”路径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资料来源：Hay (2008)，稍有改动。

在不陷入内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首先从结构观与能动观各自的极端情况来把握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一般来说，结构观经常与决定论 (determinism)、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和所有形式的目的论 (teleologism) 紧密联系在一起 (Hay, 2008)，而能动观往往与不确定性 (indeterminacy)、偶然性 (contingency)、意志论 (voluntarism) 和方法论个体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紧密联系在一起 (Hay, 2008)。前者往往假定结构享有优于能动的本体论地位，在强大的结构压力下主体及其能动都消失了，而那些隐藏在经验现象（通常通过行为体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表现出来）背后的结构才是社会运转和发展的基本模式。后者则否认这种假定，它把社会视为人的建构，并随着主体的意义和动机变化而持续不断地发生转换，从而主张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理解和解释这些主体及其能动。

从结构观的视角来看，社会科学的解释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诉诸个体能动者，研究的核心任务就是找出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确定性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视为普遍性理论的完美形式，因为它力图通过参照唯一一套普遍原则来解释一切（沃斯特，2000）。例如，马克思主张物质生产力决定社会生活，弗洛伊德认为可以通过考察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张力的化解方式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

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情感上，能动论者都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没有理解主体的解释不过是在隔靴搔痒。无论结构观的内部如何得到改

进和发展，这种观点始终具有简化主义的色彩，因为它主张将行为的种种复杂性统统归并为一套单一、普遍的原则（沃斯特，2000）。然而，人类能动的细节也许根本不能被简化。在能动理论的奠基人韦伯看来，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就应该是能动，即有意义的、由动机推动的、他人导向的行为（沃斯特，2000）。吉登斯也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考虑并诉诸能动，而社会科学理论的任务也是恢复人类行为者的概念。

与完全忽视主体的结构观相比，能动观似乎更加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尽管强调能动的学者对于哪些能动可以解释以及如何理解和解释还有很大分歧，但他们至少为主体的存在及其互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当然，我们对于结构与能动的困惑不止于此：主体到底有没有能动？如果能动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更为根本的是，结构与能动到底是两个对立的观念，还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显然，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我们很难给出答案，或者说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对于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困惑，学者们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的一致做法是尽量回避，因而我们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所能察觉到的仅仅是某种倾向而已。简单地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过是在复杂的能动（agency）背后寻找一些可能的结构（structure）而已。有些人相信这些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另一些人则从根本上质疑它。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在这一“寻找”过程中往往带着有色眼镜，而眼镜的颜色通常决定了他们所能看到的结构^①。

无论怎样，对能动及其不确定性的强调都使社会科学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覆盖律解释与因果效应显然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从方法论上看，要研究能动者的动机和选择对某一社会结果的影响，我们需要诉诸聚焦中间过程和不确定模式的因果机制。

相对于覆盖律强调外部的结构性和系统性因素而言，因果机制显然更加关注

① 无论是结构还是行动，归根结底还是研究立场的不同。在一些人看来，“尽管结构很粗糙，没有考虑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但它终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根了解这个世界的拐杖”。不过，对另一些人来说，“如果了解意味着要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来‘强奸’世界，那我宁可不了解这个世界”。

内部的能动性和非系统性因素。在蒂利看来，覆盖律解释与机制性解释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后者一般否定任何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和过程（Tilly, 2001）。而埃尔斯特也通过相互矛盾的谚语来说明由于能动者不同选择而导致的不同因果机制：“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和“吃不到禁果就越想吃”，“小别胜新婚”和“眼不见心不烦”（Elster, 2007: 9-30）。

一般来说，随着我们把社会能动纳入因果考虑之中，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确定性也就越来越弱。例如，从原因 X 到结果 Y 的因果机制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个体能动的选择与战略，不同的机制（ M_1 , M_2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Y_1 , Y_2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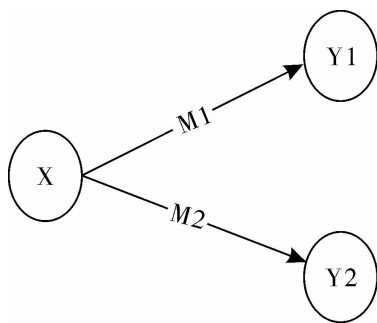


图 2 能动下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刘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案例研究》课，课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强调主体和能动的机制性解释相对于覆盖律解释似乎更加适用。一旦踏上了结构化的桥梁，我们就只有“一条路走到黑”，尽管终点很确定，但旅途却难免单调乏味。与之相比，能动者驾驶的扁舟或许能让我们领略到许多不经意间出现的美丽风景。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不再局限于探索结构化的模式，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会变得更为复杂，其研究范围也将随之扩大。例如，经济学假定理性是所有个体的基本特征，这也把那些对非理性选择和行为的研究排除在外。但是，正如埃尔斯特所言，个体的许多行为都是非理性的（Elster, 2007: 9-30）。因此，通过因果机制我们能够对那些所谓的兴趣、情绪、信念等加以研究。

此外，即使是精致、准确的结构化解释，一些不那么“硬”的社会研究者可能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解释蔑视甚至无视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个体在强大的结构压力下会有一种无力感。如果我们认同结构主义关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决定观，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最终是被（事先）决定的，并且都会导向某个终点，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坐等历史固有逻辑的自然发展罢了（Hay, 2008）。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它会使我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徒劳。

四、如何挖掘因果机制——过程追踪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因果机制这叶扁舟也能将我们带往解释社会行为的彼岸，并且已经区分了它与因果效应这座桥梁间的差异，然而，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扁舟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之前对因果机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论述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因此，我们将在这一节中介绍一种常用的挖掘因果机制的方法——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①。

随着因果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得到确认，过程追踪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其功能和作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逐渐得到认可（曲博，2010）。简单地说，过程追踪是“一种试图接近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机制或微观基础的方法”（Little, 1998: 211 - 213），或“确定原因与结果之间因果过程——因果链与因果机制——的方法”（George & Bennett, 2005: 206）。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些学者几乎都把过程追踪视为挖掘因果机制的主要手段。具体来说，对某些学者而言，过程追踪就是要通过降低层次和缩短时滞，找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环节和链条；而对另一些学者而言，过程追踪本质上就是要找到能动者，并对他们在一

① 意思相近的术语还包括：“遗传解释”（genetic explanation）、“次序解释”（sequential explanation）、“连续事件模式”（the model of the continuous series）、“因果链解释”（causal-chain explanation）、“阐释性解释”（narrative explanations）、“因果过程观察”（causal-process observations）、“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或“系统过程分析”（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等。参见 Gerring (2007: 173, note 2); George & Bennett (2005: 226)。

定结构下的选择和行为进行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过程追踪类似于侦探的破案工作，它通过追踪和回溯某个特定事件或现象的发生过程，挖掘出隐藏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机制。而要想追踪和回溯特定事件或现象，除了案例研究之外，我们几乎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从三项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研究^①出发，展示几位学者是如何追踪过程，以及他们是如何挖掘因果机制的。

（一）西达·斯科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

第一个例子是西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对法国、俄国和中国三个国家革命发生原因的比较分析。她的理论逻辑是，外部军事威胁促使国家官员去推动改革，而这会遭到支配阶级的反对；如果支配阶级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并分享政治权力，那么该阶级的反对就是有效的，并导致精英的分裂；与此同时，如果农民生活在关系紧密的村社之中，不受地主的日常监督，那么这些农民就会利用精英分裂造反，并由此引发革命。正如蒂利所言：“斯科波尔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斯科波尔，2007）带着结构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倾向，她试图去理解有关这三个革命案例的史实。而在每个案例的内部，她又试图在具体的历史细节和抽象的理论叙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从研究方法上看，斯科波尔对过程追踪的运用更多地体现在她对单个案例革命发生过程的叙述上。就法国而言，她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法国革命的发生：农业落后性、国际压力和国家自主性。同时，她把这三类原因细化为37个要素或步骤，从而挖掘出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复杂环节和链条（图3）。

^① 三位作者的专业背景属于比较政治学或国际关系，但在本文中，对他们研究方法的讨论则是出于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整体发展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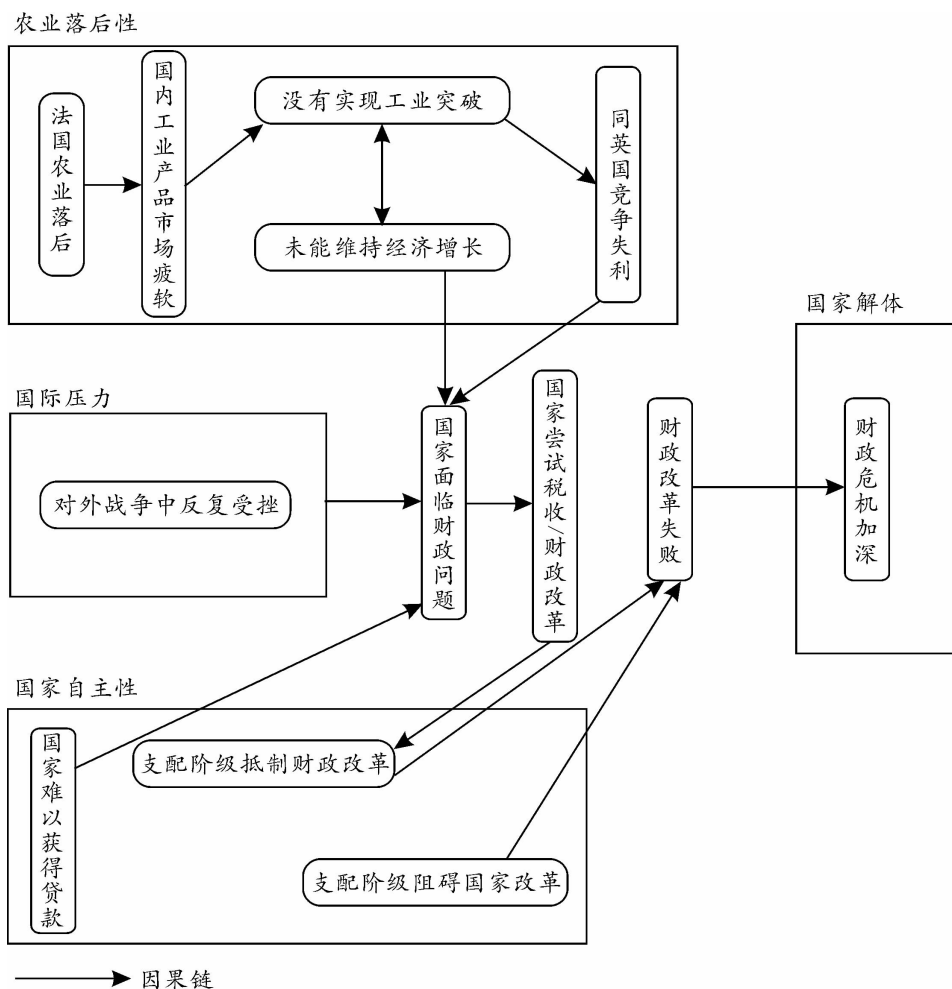


图3 斯科波尔对法国革命的解释（简图）

资料来源：马奥尼根据斯科波尔的研究总结，参见 Mahoney (1999: 1166)；Skocpol (1979)，转引自 Gerring (2007: 175)。

通过图3我们很容易看到，从“农业落后性”“国际压力”和“国家自主性”这三类原因到“国家解体”这一结果之间的过程是由许多因果机制或因果链条组成的。例如，“法国面临财政问题”是由“未能维持经济增长”“同英国竞争失利”“对外战争中反复受挫”以及“国家难以获得贷款”这四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可见，在具体的案例追踪过程中，斯科波尔通过降低层次和缩短时滞，挖掘

出了连接三类原因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多个环节和链条。例如，法国在国际层面上与英国竞争的结果，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多个变量之间的连续过程来解释的。又如，从国家尝试财政或税收改革到改革失败之间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支配阶级对财政改革的抵制。因此，通过带有倾向性的理解和重构，斯科波尔将法国革命发生的复杂历史过程以一种结构化的分析框架叙述了出来。

然而，斯科波尔过于强调结构性的变量，如“体系”“市场”“落后性”“地理位置”等。在她的研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能动的踪影，如领袖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斯科波尔追求的是宏观历史规律，而每个社会都是独特的存在，规律套在哪个国家身上进行验证都需要几番改造，理论先行的研究却不能轻易更改理论的条件与假设。于是，研究者只好“改造”（也就是建构）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牵强地用结构来解释^①。

此外，虽然斯科波尔竭力批判主观意志论，但她在根本上无法避免能动，她只是在拼命压制诉诸能动的冲动而已。例如，在同样面临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为什么日本的国家改革获得成功而中国却失败了呢？斯科波尔认为，两个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没有一个掌握土地的上层阶级，而在于日本这一阶级远远达不到中国土地特权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因此，尽管日本的土地特权阶级拼命抵抗，最后天皇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最终还是成功了。

（二）罗伯特·贝茨：《国际咖啡组织：一种国际制度》

贝茨（Robert H. Bates）在《国际咖啡组织：一种国际制度》一文中追溯了国际咖啡组织形成、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在这篇文章中，贝茨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巴西、哥伦比亚在19世纪30年代要采取行动阻止新的咖啡生产商进入国际咖啡市场？第二，为什么作为消费国的美国要加入具有卡特尔性质的国际咖啡组织？第三，为什么大咖啡生产商和大咖啡烘焙商之间可以实现共谋的合作（collusive collaboration）？第四，国际咖啡组织作为一种国际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这种制度是否有效？

^① 《读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参见 <http://www.xuanju.org/newsinfo.asp?newsid=158433>，2010年10月31日访问。

贝茨运用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的研究方法，分别尝试使用不同的模型来分析问题。在形式上，叙述与分析交错进行，每一段叙述都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个特定的问题，而每一段分析性解释（无论成功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个问题的理论导向。对贝茨来说，他的兴趣在于问题本身，而不是建立宏大的解释框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释）。他尝试用那些具体的理论或模型来解释某个事件或现象，当发现事实与理论不一致时，他就会重新回到事实并加入新的理论变量。乍看起来，贝茨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叙述逻辑和完整的分析框架。然而，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贝茨广义上的研究假定是不言自明的：理性行为者与制度约束。相对于某个单一的模型而言，贝茨的分析框架更为复杂，他认为国际咖啡组织是“次国家层次发起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代表了官员、政客和使用国家力量塑造市场结构的公司之间的联盟”（贝茨等，2008）。

在分析与叙述交错的过程中，贝茨一方面通过降低层次和缩短时滞找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环节和过程，另一方面强调理性行为者在一定国际背景下的互动和博弈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在解释美国应对国际安全威胁的不同选择时，贝茨的分析层次从国际关系层面降低到国内政治层面，转而讨论美国众议院、参议院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这样，通过降低分析层次，贝茨更好地解释了美国国际政策的制定过程。而在对国际咖啡组织的过程追踪中，贝茨没有试图给出某种确定性的解答，而是强调行为者之间博弈的不确定性——不同的偏好或选择可能产生不同的因果机制——最终将导向不同的结果。例如，贝茨构建了美国众议院、参议院和行政部门之间互动的空间模型，描述这三类行为者在两个不同时期对国际安全的不同评价，即他们愿意用多大的成本支出来抵消共产主义的威胁，从而解释美国在两个不同时期对国际咖啡组织的不同态度。

（三）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与近代欧洲早期有着类似的国际竞争过程，但为什么中国最终由分裂走向统一，而欧洲自中世纪起就一直保持分裂状态，也就是多国体系状态？这是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她给出的答案是，即使在相同的结构下，不同战略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具体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争霸国选择了自强型改革，并采取了抵消制衡的战略和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扩张，从而实现了秦帝国的大一统；相反，近代欧洲的争霸国没有采取自强型改革，也没有推行分而治之战略和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而是代之以自弱型的权宜之计，因而出现了多国体系状态（表4）。

表 4： 自强型改革与自弱型权宜之计

自强型改革	自弱型权宜之计
（通过加强管理能力进行动员）	（依靠处于中介地位的实权人物进行动员）
以国家征召的方式建立常备军	依赖军阀和雇佣兵来建立常备军
征收直接和间接税；提高经济生产能力	通过中间包税人来征收普通税；贷款和信贷为特别收入
以贤人政治代替贵族制	向私有资本持有者出售官职

资料来源：许田波（2005）。

许田波从世界政治的动力理论（Dynamic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出发，认为在国际竞争过程中存在两种逻辑——制衡逻辑（Logic of Balancing）与大一统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在这一框架下，国际竞争被看作是争取大一统的争霸国与其要吞并或支配的对象之间的战略互动过程，两者运用竞争性的策略，同时得益并受制于竞争性的因果机制。”（许田波，2005）由此可见，许田波是带着能动的倾向建立了自己的逻辑分析框架，她试图通过行为者（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来解释国际竞争的结果。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已不再是普遍规律（许田波，2005）。从表4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自强型改革与自弱型权宜之计之间的差异，二者通过不同的环节和路径产生了不同的因果机制。

例如，许田波在讨论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时写道，争霸国的统治者在国际体系形成之初就着手进行自强型改革，自强型改革使争霸国能够动员更多的战争资源，打更多的胜仗并从征服中获益，从而使自身占据了更为有利的竞争位置。在丧失领土司空见惯甚至生存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各国都被迫坚持不懈地深化各自的自强型改革，甚至不惜使用肮脏的计谋和残酷的策略。正是在这种日益变得野蛮卑鄙的世界里，后发的秦国才能通过推行最为全面的自强型改革，最为残酷

无情的战略策略，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到，在追踪大一统机制的具体发生过程时，许田波缩短了相邻环节之间的时滞。争霸国在每一个关键时点上的决策——无论是自强型改革还是推行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策略——都促成了大一统的结果。而在解释秦国为什么能克服制衡逻辑时，许田波将目光转向秦国内部，强调商鞅变法自强型改革的作用。这样，通过降低分析层次，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在国际层面的争霸表现。

与斯科波尔和贝茨相比，许田波更加强调战略行为者之间的选择和互动，甚至说她整个研究过程就是围绕这一原则展开的。显然，许田波在结构与能动的对立中站到了能动一边，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中站到了非决定论一边。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也考虑能动，但在他们看来，由于成本上升机制等原因，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塑造作用是不可突破的^①。比较而言，许田波在这个问题上走得要更远一些，她认为能动有时可以突破结构的限制，而能否突破就在于国家本身的能力和战略。

通过上述三个例子，我们展示了不同研究者如何运用过程追踪方法挖掘不同的因果机制^②。我们重点讨论的是他们对单个案例的叙述和分析，尤其是三位研究者如何追踪案例过程以及如何挖掘因果机制。

我们的讨论强调了研究者使用过程追踪挖掘因果机制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过程追踪在理论指导下通过更加具体的事实和细节来揭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环节和链条，从而揭示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第二，过程追踪为强调和研究能动提供了可能，通常的做法是把能动者的选择和战略作为产生不同因果机制甚至导向不同结果的起点^③。当然，对因果机制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对上述两个特征的

① 参见 Snyder (1991); Zakaria (1998)，朱天飏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恰恰是要突破新现实主义用结构对单元的塑造和约束”。参见 Lobell et al. (2009); Freyberg-Inan et al. (2009)。

② 当然，过程追踪并不是他们在研究中用到的唯一方法。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过程追踪与其他研究方法之间是互补性关系。而不是替代性关系。参见 Little (1998: 211 - 213); Gerring (2007: 177)。

③ 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陈慧荣在邮件反馈中（2010年11月5日）强调，关键是“过程追踪中能动者做出选择的时机（timing）和安排策略的次序（sequence）”，具体可参见 Pierson (2000)。

重视程度也不一样，例如斯科波尔就更强调第一点，而许田波则更强调第二点。

比较起来，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可能更具争议，要回答三位学者到底是如何追踪案例过程的，这更多涉及我们自身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三位研究者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不仅仅是简单地追溯和重现过程，而且是带着自己的情感、理智和理论导向去理解并重构过程。也就是说，研究者首先基于自身的思想、感情和经验设计出理论分析的逻辑框架^①，然后带着倾向和偏见进入研究对象，建构自身对文本和史实的解读，并且通过一定的表达形式（讲故事的线索和文字的表达艺术）把它们传递出来^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与小说家和诗人一样从事着虚构故事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也是遵循流派和文体规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规则）的“文学作品”制造者。当然，我们的主张并没有走到这样的极端，只是强调研究者要像猎狗一样嗅到文本和故事的味道，然后通过某种逻辑结构或推演过程将故事叙述出来，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研究者对能动者的理解。社会科学家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变成人文学者或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在研究之前已经设计好了解释的逻辑结构与框架。

（四）两个延伸问题

在结束之前，我们还要探讨两个相关的问题。虽然对整篇文章来说，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对它们的讨论仍然不可或缺。

埃尔斯特指出，定律与机制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机制由一系列链条组成，每个链条仍然是一个定律（广义上的“定律”概念），更要命的是每个链条内部的“黑箱”仍然未知（George & Bennett, 2005: 142 - 144）。那么，对因果机制的挖掘到底应在哪里停下来呢？

无论是分析层次还是追踪环节，挖掘因果机制的程度都取决于特定的研究问

① 这也就是皮尔斯所强调的观点，即研究者需要在前言中明确表明自己的偏见，具体可参见 Pierce (2008: Preface)。

② 正如赵鼎新所言：“社会科学研究永远也离不开，也不应该离开像韦伯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等带有一定哲学色彩的理论的指导。理想的社会科学状态是一个以机制为基础的，在带有一定哲学色彩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而敏锐的解读，则是发现微观机制的有机组合方式、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互动及其关系，以及新型研究视角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哲学、实证研究和解读之间的结合。”（赵鼎新，2006）

题以及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论倾向。如研究者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出，他以什么样的理论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是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乔治和贝内特也认为，在什么层次以及哪个链条上停下来，取决于“特定的研究问题和基于调查的研究目标”（George & Bennett, 2005: 144）。不难看出，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有些应然性的倾向，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或者根本就没有确定的答案）。

在默顿（Merton）看来，社会学很难像物理学那样发展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或大一统理论（unified theory），只能集中建设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①，这样的理论既不是总结日常细节所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宣称能包罗社会世界所有事件的理论范式，而是中和这两种立场的产物（Merton, 1968: 39 - 72）。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埃尔斯特等人才发展出有关因果机制的观点（Mayntz, 2004）。

然而，不管怎样，强调因果机制而不是因果关系，都让研究变得更复杂了。在探寻出一个又一个机制之后，这些形态迥异的机制对于强调逻辑一致性的理论建设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是否可以把某些相似的机制“打包”（package）？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特殊化的策略（particularization）^②来推动理论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些具有相同的背景或初始条件的因果机制“打包”整理，从而形成所谓的中程理论。得出的这样的理论并不是我们事先计划好的，因而它们也被称为偶然理论（aleatory theory）。当然，实际经验研究中将因果机制整合为中程理论的过程可能更加复杂，也会遇到更多更棘手的麻烦，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结语

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已经在形式上完成了对

① 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类型理论”（typological theory），其基本想法与中程理论一致，如集体选择理论、认知驱动理论等，参见 George & Bennett (2005: 233 - 262)。

② 德斯勒（Dessler）注意到，解释事件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普遍化策略，也就是把这一事件作为某类事件的一个例子；另一种是特殊化策略，也就是描述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一系列细节，而没有必要把这一事件放到某一大类之中，参见 Dessler (2003)。

这一问题的探讨。从头至尾，我们都是在展示一幅以因果机制为中心的方法论图景：由于覆盖律和因果效应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果机制应运而生；不同机制观的背后是研究者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不同倾向；打开黑箱和强调能动的冲动是社会科学探求因果机制的主要原因；挖掘因果机制的关键在于过程追踪。

麻烦仍然不少。与覆盖律和因果效应相比，因果机制使社会科学研究变得更为复杂，更贴近“能动”，更不“科学”。既然如此，我们干吗还要探寻因果机制呢？奥卡姆剃刀始终就悬在我们的头顶，摇摇欲坠。谁不想用最简单的结构去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谁不想用简单的命题概括出整个宇宙的规律？这种强迫症一般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其说是在追求真理，不如说是在追求美^①。

不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也正是会在此凸显：当个体能动者发现自己处于结构的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反思性会使他产生强烈的冲动，想要冲破这一结构的牢笼，寻找个体行动的空间。而研究者，首先是一个人，在研究之前，他得先理解才能去解释。因此，因果机制对研究者自己的意义，很可能不仅是直接帮助他解释得更深入，而是有助于他缓解理解上的焦虑^②。在覆盖律的画面中没有哪里适合容纳我们的欢愉和悲苦以及我们的道德诉求与艺术理想（陈嘉映，2007）。可是，这幅有关因果机制的方法论图景却能允许非结构性的因素流动，允许自由意志的个体存在，允许不确定的能动出现并起作用。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是基于因果机制的方法论思路带给社会研究者最根本的价值。

① 庞加莱也曾说过：“科学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研究大自然；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大自然不是美的，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大自然不值得了解，生命就不值得活着。”参见牛顿（2001）。

② 作为社会研究者，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一些的话，我们就应该无奈地承认，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不光会在简·奥斯汀的爱情小说中出现，它还伴随着研究的整个过程。一旦开始考虑因果机制，这种纠缠就会愈来愈明显，研究中的平衡也愈发难以把握。如何萌发研究冲动，如何区分规范与实证，如何平衡结构与能动，如何驾驭理智与情感，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一杆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参考文献

- 埃尔斯特(2009). 心灵的炼金术. 郭忠华、潘华凌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埃尔斯特(2010). 政治心理学. 陈秀峰、胡勇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 奥卡莎(2009). 科学哲学. 韩广忠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贝茨等(2008). 分析性叙述. 熊美娟、李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波普尔(1987). 科学知识进化论. 纪树立编译. 上海: 三联书店.
- 波普尔(1999). 开放的宇宙. 李本正译.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 陈嘉映(2007). 哲学·科学·常识.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陈晓平(2003). 休谟问题评析——兼评“归纳问题”与“因果问题”之争. 学术研究, 1.
- 陈云松(2008). 分析社会学——寻求连接微观与宏观的机制性解释. 浙江社会科学, 5.
- 海星(2009). 读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参见: <http://www.xuanju.org/newsinfo.asp?newsid=158433>.
- 吉登斯(2001). 何为社会科学. 于海译. 社会, 11.
- 康德(1978). 导论: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 庞景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骥(2009). 找到微观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国困境. 开放时代, 1.
- 牛顿(2001). 何为科学真理——月亮在无人看它时是否在那儿. 武际可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曲博(2010). 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 世界经济与政治, (4).
- 斯科波尔(2007).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何俊志、王学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所罗门(2004). 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 张卜天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索罗斯(1999). 金融炼金术. 孙忠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沃特斯(2000). 现代社会学理论. 杨善华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休谟(1980). 人类理解研究.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许田波(2005). 大一统对抗制衡. 国际政治科学, 1.
- 许田波(2009). 战争与国家形成: 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徐进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徐向东(2008). 理解自由意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华夏 (2002). 科学解释标准模型的建立、困难与出路.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

赵鼎新 (2006).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曾志 (2001). 西方哲学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bell, P. (2004). Narrative Explanation: An Alternative to Variable-Centered Explan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Achen, C. H. (2002). Toward a New Political Methodology: Microfoundations and AR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

Bennett, A. (2003). Beyond Hempel and Back to Hume: Causal Mechanisms and Causal Expla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Berofsky, B. (1966).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Bhaskar, R. (197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Boudon, R. (1986).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A Critical Appraisal*. Oxford: Blackwell.

Brady, H. E. & Collier, D. Eds. (2004).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Brown, R. H.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Toward a Logic of Discover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nge, M. (1997). 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 (4): 410 – 465.

Bunge, M. (2004). How Does It Work? The Search for Explanatory Mechanism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 182 – 210.

Clifford, J. (1988). On Ethnographic Self-Fashioning: Conrad and Malinowski. In Clifford, J.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ssler, D. (1991). Beyond Correlations: Toward a Causal Theory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5 (3): 337 – 355.

Dessler, D. (2003). Explanation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In Elman, C. & Elman, M. F.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Doyle, M.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3): 205 – 235.

Donohue III, J. J. & Levitt, S. D. (2001). The Impact of Legalized Abortion on Cri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Elman, M. F. Eds. (1997). *Paths to Peace: Is Democracy the Answ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Elster, J.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ster, J. (1998). A Plea for Mechanisms. In Hedström, P. & Swedberg, R.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ster, J. (2007).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lletti, T. G. & Lynch, F. J. (2009). 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 (9): 1143 – 1166.

Freyberg-Inan, A., Ewan, H. & Patrick, J. (2009). *Rethinking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eorge, A. L. & Bennett, A.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IT Press.

Gerring, J. (2007).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ring, J. (2008). Review Article: The Mechanismic Worldview: Thinking Inside the Box.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161 – 179.

Gerring, J. (2010). Causal Mechanisms: Yes, Bu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3. Available on line: <http://cps.sagepub.com/content/43/11/1499>.

Harre, R. (1970).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y, C. (2008).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Marsh, D. & Stoker, G.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Hedström, P. & Petri, Y. (2010). Causal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49 – 67.

Hedström, P. & Swedberg, R. (1996). Social Mechanisms. *Acta Sociologica*, 39 (3): 281 – 308.

Hedström, P. & Swedberg, R. (1998). Social Mechanism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Hedström, P. & Swedberg, R.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mpel, C. G. (1965).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In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Hempel, C. G. & Oppenheim P. (1948).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5 (2): 135 – 175.

Hitchcock, C. R. (1995). Discussion: Salmon on Explanatory Releva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62 (2): 304 – 320.

King, G., Keohane, R. O. & Verba, S.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ser, E. & Hechter, M. (1998).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Rational Choice and Its Cr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3): 786 – 816.

Kitschelt, H. (2003). Accounting for Postcommunist Regime Diversity: What Counts as a Good Cause. In Ekiert, G. & Hanson, S. Eds.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Communist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yne, C. (1994).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2): 135 – 175.

Lewis – Beck, M., Bryman, A. & Liao, F. T. Eds. (2003).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Washington D. C.: Sage Publications.

Little, D. (1991). *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Little, D. (1998). *Micro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Lobell, S. E., Ripsman, N. M. & Taliaferro, J. W. (2009).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yon, A. (1974). Criteria and Evidence. *Mind*, 330: 211 – 227.

Machamer, P., Darden, L. & Craver C. (2000). Thinking about Mechanisms. *Philosophy of Science*, 67 (1): 1 – 25.

Mahoney, J. (1999). Nominal, Ordinal, and Narrative Appraisal in Macrocaus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4): 1154 – 1196.

Mahoney, J. (2001). Beyond Correlational Analysis: Recent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Sociological Forum*, 16 (3): 575 – 593.

Mayes, G. R. (2001). Theories of Explanation.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iep.utm.edu/explanat/>.

- Mayntz, R. (2004). Mechanisms in the Analysis of Macro-Social Phenomena.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 (2): 237 – 259.
-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Owen, J. M. (1994).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2): 87 – 125.
- Pawson, R. (2000). Middle-Range Realism. *Archive Européenes de Sociologie*, 41:283 – 325.
- Pears, D. F. (1963). *Freedom and the Will*. New York:St. Martin's.
- Pierce, R. (2008). *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s: A Practical Guide*. Washington D. C.: Sage Publications.
- Pierson, P. (2000). Not Just What, but When: Timing and Sequence in Political Processe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4 (1): 72 – 92.
- Ray, J. L. (1995). *Democra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Evolu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Reskin, B. F. (2003). Including Mechanisms in our Models of Ascriptiv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5 – 97.
- Salmon, M. H. (1992).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 Salmon, M. H. (2003). Causal Explanations of Behavior. *Science of Philosophy*, 70 (4): 720 – 738.
- Salmon, W. C. (1984).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the Caus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lmon, W. C. (1989). *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almon, W. C. (1998). *Causality and Expla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yer, A. (1984).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London: Hutchinson.
- Scriven, M. (1959). Explanation and Prediction in Evolutionary Theory. *Science*, 130:477 – 482.
- Sil, R. & Katzenstein, P. J. (2010).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8:411 – 431.
-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 L.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eel, D. (2004). Social Mechanisms and Causal Inferenc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 (1): 55 – 78.

- Stegmuller, W. (1977). The Problem of Induction: Hume's Challenge and the Contemporary Answers. In *Collected Papers on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Stinchcombe, A. L. (1991). The Conditions of Fruitfulness of Theorizing about Mechanisms in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1 (3): 376 – 388.
- Tabery, J. G. (2004). Synthesizing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 the Concept of a Mechan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71 (1): 1 – 15.
- Tilly, C. (2001).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21 – 41.
- Veyne, P. (1984). *Writing History: Essay on Epistemology*. Middletown: Wesleyan Press.
- White, H.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 (1978). The Fictions of Factual Representation.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Yee, A. S. (1996). The Causal Effect of Ideas 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1): 69 – 108.
- Zakaria, F.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